

1945—1952 年美国占领期间日本公共图书馆的改革历程

曹 磊

摘 要 1945 年到 1952 年美国占领日本期间,盟军总部通过设立 CIE 图书馆,设置图书馆担当官,推动图书馆立法和促进专业队伍建设等举措,在以图书馆担当官为核心、日本政府具体执行、图书馆界参与的体制之下,对日本公共图书馆理念、服务、运营和人才培养等多方面进行现代化改造,打造新的公共图书馆体系。这是日本图书馆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转变占领初期支持民主改革的政策,影响到改革的进程。改革在 1946 年起步,在历经起步、展开与转折、收尾的主要阶段之后,1950 年《图书馆法》正式出台,标志着改革基本结束。总体上,日本公共图书馆的转型较为成功,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改革是战后美国文化输出的具体例证。参考文献 26。

关键词 图书馆史 公共图书馆改革 日本 美国 文化输出

分类号 G259

Japanese Public Library Reform During U.S. Occupation from 1945 to 1952

CAO Lei

ABSTRACT

During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from 1945–1952, GHQ/SCAP carried out a comprehensive social reform in Japan to eliminate militarism. In the reorientation and reeducation policy, public library was considered as a tool for disseminating democracy. Japanese public libraries at that time were unable to take this responsibility. So public library reform began as early as 1946.

There were four main steps in the reform. First, to establish CIE libraries, which introduced American style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and models to Japanese people and library community. Second, to appoint CIE library officers, whose duty was to guid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library community and coordinate the Japanese side and the U.S. side in a way of “Friday Meeting”. Third, to promote public library legislation, which was a core work of the reform. Forth, to develop training system by setting up library science in tertiary education like Keio University and in-service training around Japan.

From 1946 to 1950, under the mechanism formed by library officers as a core, Japanese government as the executive, and Japanese library community as a participant, Japanese public libraries had been transformed in idea, service, operation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There were three main stages in the reform. The first stage (1946.3–1947.4) was called “the time of Keeney”. Keeney, the first CIE library officer, planned to

通信作者:曹磊,Email:caolei@pku.edu.cn,ORCID:0000-0001-9674-2823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CAO Lei,Email:caolei@pku.edu.cn,ORCID:0000-0001-9674-2823)

build a national network of public library service, which finally failed to be carried out. In the second stage (1947.5–1949.3), the Japanese library community made many drafts of library act. Because of the cold war at that time, the GHQ/SCAP didn't have its focus on public library reform so that legislation was delayed. In the third stage (1949.4–1950.8), Japanese library community realized that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as the key to successful library legislation and the *Library Act* was finally passed in 1950.

In the reform, America acted as a conductor and planner who prioritized its own interests. The reform was basically successful, but at the same time problematical. Japanese government, the particular executive, had followed American's steps rigidly. Japanese library community had participated the entire reform. After *Library Act* was passed, Japanese library community strived to put the principle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law in place, so that Japanese public libraries could gradually catch up with the levels of Europe and United States.

The reform, an epitome of education, culture and society reform in Japan, was a great event in Japanese public library history. It was also an example of American culture exportation to postwar Japan, which led to Japanese Americanization both in material and spirit aspects. 26 refs.

KEY WORDS

Library history. Public library reform. Japan. U. S. Culture export.

0 引言

1945年8月到1952年4月,美国对日本实行单独占领^①。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缩写为GHQ/SCAP, 简称盟军总部)^②的主导下,日本进行了民主改革,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改革过程中,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得到了全方位改造。1950年4月,《图书馆法》的通过,标志着日本战后公共图书馆事业框架初步形成。

研究1945年到1952年日本公共图书馆的改革历程,有着多方面的意义。首先,有助于了解日本公共图书馆的历史。在美国的主导之

下,日本公共图书馆产生了全方位的变化,突出自身的服务性、免费性和专业性,承担起维护民主、自由的重要社会职责。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从近代走向现代的转型期,也是战后发展的起点,奠定了此后六十余年间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基础。其次,有助于了解日本社会改革的发展状况。公共图书馆作为日本教育、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③,其改革的过程是日本教育、文化事业乃至社会改革的一个缩影。经过改革,来自美国的理念和实践在日本这片异质的土地上生根开花。与很多改革一样,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民主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也留下了许多遗憾和不足,时至今日,这些问题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再次,有助于了解战后美国的文化输出。战后

① 1945年8月,美军进驻日本,开始单独占领。1951年9月,以美国为首的48个国家(中国未参与)与日本单方面签订《旧金山和约》,同时美日签订《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美国和日本成为同盟关系。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美国结束对日本的占领。

② 由美国实际控制,总司令为麦克阿瑟。

③ 在日本,公共图书馆属于社会教育机构,是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日本的文化事业是从教育事业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般将教育、文化事业并称。

日本成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基地,深深地印上了美国的烙印,日本公共图书馆也是如此。改革的历程实际上是日本接受美国图书馆学理念和实践的过程。分析日本的案例,可以了解美国图书馆学乃至美国文化如何影响全球。

1 改革的背景

1.1 美国的动机

日本投降后,美国发布《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U. S. Initial Post-Surrender Policy for Japan*),贯彻《波兹坦公告》以来的政策,明确对日“民主化”“非军事化”改造的方针^[1]。1945年8月28日,盟军总部成立,全面负责占领和改造日本的具体事务。在明确方针政策的指导下,盟军总部以间接统治的方式,通过日本政府开展全方位改革,促使日本朝着美国预期的民主、自由国家转变。

在改革过程中,美国高度重视日本教育、文化事业的作用,希望通过“再定位”(reorientation)、“再教育”(reeducation)^{[2]94}政策,改造所有日本人的意识形态,清除军国主义的影响。美方在《日本人的再定位》(*Reorientation of the Japanese*)文件中指出,要“利用所有适当的媒体,包括图书、教科书、期刊、电影、广播、讲座、研讨班和各类学校”^{[2]95},有效改造日本人的思想。其中,图书、期刊、电影、讲座、研讨班等媒体或活动形式都与公共图书馆相关。由此,公共图书馆被“再定位”“再教育”政策赋予了重要使命,承担起影响、改造日本社会意识形态的职责。

具体执行“再定位”“再教育”政策的机构是盟军总部下设的民间情报教育局(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Section, CIE)。该局成立于1945年9月,职责是为盟军总部收集各种信息,制定教育政策计划,促成教育、文化领域

的日美合作,普及民主思想。1946年初,在CIE的主持下,美国派出教育界专家到日本实地考察,专家意见汇总为《美国对日教育使节团报告书》。报告书上报给盟军总部批准之后,成为战后日本教育、文化事业改革的指南。报告书的第五章“成人教育”部分重点谈及公共图书馆,认为公共图书馆是普及民主思想的公共机构,要向社会免费开放,提供服务,日本政府应当设置专职官员管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要注重儿童服务,等等^{[3]107-108}。报告书有关公共图书馆的论断是对“再定位”“再教育”政策的具体细化,使得公共图书馆改革有了清晰的方向和目标。

1.2 日本的情况

美国希望通过公共图书馆改造日本社会和民众的思想,然而在民主改革全面开展之前,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在职能、理念、资源、服务、运营等多个方面依旧处在战前的惯性车道上,并没有打破军国主义的枷锁,还不足以承担起这一责任。

战前,日本的公共图书馆完全沦为军国主义的附庸。1933年,日本修改《图书馆令》,通过新确立的中央图书馆制度全面强化政府对公共图书馆的管制。当时的日本公共图书馆主要向民众提供馆内有偿阅览服务^①,馆藏书刊均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健全有益”的资料,全面禁止与政府理念相违背的社会科学、左翼思想文献。公共图书馆作为“思想善导”的教化机关,成为军国主义政府控制阅读、控制思想的工具,旨在培养“良民”“顺民”。由于被绑在了失控的“战时体制”列车之上,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在二战中遭受了惨重损失。据1946年5月的统计,日本全国公立图书馆总数是2544家,比1922年下降21.5%,藏书总量是737万册,比1922年下降22%。日本各地的中央图书馆,59%的藏书毁

① 当时日本公共图书馆的主要服务形态是有偿阅览,即入馆要收取费用,阅览室均为闭架,如果要外借,读者要找到中保人,同时要缴纳外借费用。

于战火,市立图书馆 80% 的藏书毁于战火^[4]。

战后初期,日本民间的读书浪潮不断兴起。当时,日本城乡各地纷纷成立各种类型的读书会,如 1947 年长野县就有 104 个读书会^{[5]37}。读书会或称读书指导活动是战前日本公共图书馆开展的最主要活动,以控制思想为主要目的。战后读书会的复兴则是民主改革浪潮下群众运动的全新产物,是民间自发交流学习民主科学、文化知识的活动。农村的不少民众在“劳动文化联盟”等群众组织的支持和指导之下,在有限的空闲时间集体或者轮流借阅书籍。这种读书会活动既应对了缺乏书籍的实际情况,又满足了青年的求知欲望。日本的公共图书馆在此时也着手重建读书会。石川县图书馆从 1946 年开始将农村的复员青年军人组织起来,开展读书指导活动,提出要通过读书会活动坚定他们的信念,进而“护持国体”^{[5]39-40}。“护持国体”指的是维护日本以天皇为首的政权不发生改变),全盘采用战前军国主义的理念与方式推动民间读书会的发展。很显然,这种管制思想、压抑民众的做法,与当时民主、自由的思潮截然对立,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在自上而下(美方)和自下而上(日本民众)的两股力量共同推动下,日本公共图书馆的改革成为弦上之箭。

2 主要政策

2.1 概述

1945 年 10 月,盟军总部发布“五大改革指令”^①,开始全面推动日本社会的民主、自由进程。在《美国对日教育使节团报告书》出台之后,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改革正式起步。改革贯彻了间接统治的原则,通过展示、指导、帮助等方式,推动日本政府实施公共图书馆事业改革。根据时间的先后顺序,美国开展的主要改革政策有设立 CIE 图书馆,设置专职官员,推

动图书馆立法和促进专业队伍建设。这四项政策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在专职官员的领导下,向日本社会展示和提供美式公共图书馆服务的理念和模式,重点推动立法活动,并构建起日本公共图书馆专业人才的培养体系,有层次、有侧重地完成改革。

2.2 设立 CIE 图书馆

2.2.1 概况

CIE 图书馆的正式名称为 CIE 信息图书馆(CIE Information Library),在 1948 年 8 月之后,更名为 CIE 信息中心(CIE Information Center),日本民间一般习惯称之为 CIE 图书馆。1945 年 11 月 15 日,CIE 在东京开设了第一家向日本人开放的小型图书馆,到 1946 年 3 月,图书馆移至东京日比谷重新开馆。此后,CIE 共在日本 22 个城市(一般人口在 20 万以上)开设了 23 家图书馆(东京有 2 家),其中 6 家是应日本地方政府要求建设的。CIE 图书馆采用总分馆管理体制,以东京日比谷 CIE 图书馆为总馆,其他各家图书馆为分馆,由 CIE 情报课信息中心统一运营管理。各家分馆的馆长均为美国人,普通职员可聘用日本人。CIE 要求担任分馆馆长的人士必须符合美国图书馆协会专业馆员的资格条件,即应当具备大学学历且取得图书馆学学位。在美国结束占领日本之后,CIE 图书馆转为美国文化中心,承担起美日文化交流的任务。当然,CIE 图书馆也承担着收集日方情报,培养亲美人士的职责。

2.2.2 提供美式图书馆服务

CIE 图书馆一般设置开架阅览室、儿童阅览室和活动场所,提供的资源不仅有图书、杂志、报纸,还有唱片、电影胶卷和幻灯片等。大部分 CIE 图书馆均有 1 万册以上的图书,数百种报刊杂志。馆藏文献有一定的配比比例,以横滨 CIE 图书馆为例,各学科图书的比例是:科学技术类

① 指令的具体内容是促进妇女解放,鼓励成立劳工组织,促进学校教育民主化,撤销各种秘密镇压机构,促进经济机构民主化。

34.4%, 艺术类 15.1%, 文学类 12.6%, 经济类 10.1%^{[6]131}。除了提供借阅和参考咨询服务之外, CIE 图书馆还开展各类活动, 例如演讲会、电影放映会、音乐会、交谊舞会等, 向日本民众介绍美国国情和文化, 潜移默化地影响日本人的情感和思想。

根据美方的统计资料, CIE 图书馆的设立让日本民间出现了使用图书馆的热潮。读者以学生最多, 至少在 40% 以上, 以 30 岁以下的人群居多, 一般在 60% 以上^{[6]94-150}。在三年九个月的时间内, 日比谷 CIE 图书馆到馆读者达到 137 万人次^{[6]102}, 年均近 37 万人次, 而当时日本公共图书馆一年的到馆读者数量仅 450 万人次^{[3]422}, 年均每馆才 1 800 人次。在两年三个月的时间内, 日比谷 CIE 图书馆共计外借 12 万余册图书, 年均 5 万余册, 而当时日本公共图书馆全年外借总数才 400 余万册^①, 年均每馆不满 2 000 册。CIE 图书馆丰富多彩的读者活动更是日本民众没有接触过的新鲜事物。在三年内, 札幌 CIE 图书馆共举办各类活动 721 场次, 参加活动读者为 47 173 人次^{[5]118}, 年均举办活动 240 场次, 每场参与读者为 653 人次。

2.2.3 提供发展范例

与日本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相比, CIE 图书馆的先进之处体现在六个方面: 免费开放, 构建图书馆服务网络体系, 注重外借, 开展借阅、参考咨询、读者活动等多项服务, 关注女性、儿童、青少年等特殊群体, 提供多元文化服务。CIE 图书馆的活动向日本图书馆界展示了当时美国中小型图书馆的具体形态。“以读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和实践, 特别是免费开放、注重外借、关注儿童三项内容, 在 20 世纪 60 年代被日本公共图书馆全面吸收和继承, 推动了事业的快速发展。此外, CIE 图书馆还促进了日本女性馆员的解放运动。在 CIE 开设期间, 共有 50 名美国图书馆员到日本任职, 其中 32 名是女性, 占到总数的

64%^[7]。当时美国图书馆员女性比例达到 90% 左右^[7], 因此来日馆员的女性比例较高。当时整个日本社会思想极为封建、保守, 公共图书馆均设置单独的女性阅览室。美国女馆员与日本女职员一起, 充满热情地为民众提供各种图书馆服务。在她们的影响之下, 当然也是在民主改革提倡男女平等的大环境之下, 日本图书馆界乃至日本社会逐步改变对女性馆员的看法, 意识到女性同样能够把包括图书馆在内的社会机构办好、管理好、发展好, 能够让工作氛围“轻松、愉悦”起来^[7]。

2.3 设置专职官员

2.3.1 概况

盟军总部在 CIE 教育课设置了专门负责图书馆事务的官员——图书馆担当官。从 1946 年到 1950 年, 先后有四位美国人士出任图书馆担当官, 分别是专任官员基尼 (Phillip O. Keeney, 任期为 1946. 2—1947. 4)、伯内特 (Paul J. Burnette, 任期为 1947. 10—1949. 4)、法尔薇瑟 (Jane Fairwether, 任期为 1949. 4—1949. 9) 以及兼职官员尼尔森 (John M. Nelson, 他的本职工作是 CIE 的成人教育官员, 任期为 1947. 5—1947. 10 和 1949. 10—1950. 8)^{[3] 34-86}。图书馆担当官是美国实施日本图书馆改革的代言人, 日本战后图书馆事业的重要事件, 基本都是在担当官主导下完成的。美方选择担当官人选的时候, 提出了一系列条件, 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毕业于美国第一流的图书馆学专业院校^{[6]37}。严格的选人标准有助于日本公共图书馆改革获得专业的指导、规划和引领, 保证其向美式公共图书馆体系成功转变。

2.3.2 职责

图书馆担当官的具体职责是负责与改革相关事务的“立案、实施、指导和建议”^{[3]36}, 主要体现在贯彻、引导和把关三个方面。首先是贯彻,

① 根据当时的数据, 日本人均外借数量为 1/17 册, 乘以当时日本 7 000 余万人, 得到总的外借数量为 400 余万册, 数据来源同[3]422。

担当官将改革的理念和政策传达给日方。《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对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提出具体的改革意见。与报告书发表的同月,基尼《日本统一的图书馆服务》(简称“基尼计划”)正式出台,扩展报告书的意见,提出构建统一的日本图书馆服务体系。在盟军总部做出优先发展公民馆决策的时候,担当官将政策改变告知日方,推迟公共图书馆的立法工作。其次是引导,担当官指导日方朝着美方设定的政策目标推进改革。战后初期,日本政府和图书馆界依旧受到旧思想、旧观念和旧做法的影响,对于公共图书馆事业的认识和实践,与美方的期望还有很大的差距。担当官引导日本方面认同美国的理念和实践,保证改革的方向不出现偏离。再次是把关,担当官根据政策及形势的需要审核、判断日方的举措。日本图书馆界一直希望通过增加政府投入发展公共图书馆事业,担当官对此并不支持,一方面这不符合日本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担当官认为公共图书馆应当依靠民众而不是政府的强制力来求得发展。所以,在担当官的反对之下,《图书馆法》最终没有加入强化政府支持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内容。

2.3.3 交流机制

为了加强与日本政府和图书馆界的交流,图书馆担当官积极参加日方的相关会议和活动。基尼认为担当官开展工作必须依靠日方的支持。他采用“民主的方式”——召开会议来说服日方人士^{[3]426}。众多的会议之中,“金曜会”的作用颇为重要。这一交流机制创设于基尼任期内的1947年1月末,一直持续到1949年7月^{[3]54},构筑起图书馆担当官、文部省和图书馆界之间的沟通桥梁。“金曜会”名称的由来是因为会议被安排在每周金曜日(周五)^{[3]54}。这一会议由日本图书馆协会主办,与会人员包括日本图书馆界人士、文部省官员和图书馆担当官。每次会议预先设定主题,与会者在会前根据主题进行调查和研究,在会上自由交流发言。1947年一年,“金曜会”讨论的议题达30项,起

到了“为全国性的重要图书馆问题提供专家技术性指导意见”和“为美方提供关于日本图书馆事业信息”的重要作用^{[3]54}。基尼离任之后,这一机制得到延续。“金曜会”的关键作用是推动《图书馆法》制定工作全面展开。1947年5月底到7月的五次会议持续讨论有关图书馆立法的主题,在形成统一意见之后,会议资料提交给中央图书馆馆长会议等全国性会议进行解释和说明^{[3]56-58}。经过“金曜会”的讨论,公共图书馆法律草案日益增多,业界对立法的认识也日益深入,有效促进了公共图书馆立法活动的开展。

2.4 推动图书馆立法

2.4.1 改革核心——立法

纵观美国主导下的日本民主改革,构建法律体系是核心内容。从制定“和平宪法”开始,战后日本形成了完整而严密的法律体系结构,将美国“非军事化”“民主化”的方针政策通过各个层次的法律固化下来。在“和平宪法”的原则之下,日本的《教育基本法》《社会教育法》相继制定。在这些法律的原则及内容的指导下,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基本法《图书馆法》最终在1950年4月正式通过。1946年6月,基尼在日本全国中央图书馆馆长会议上的致辞中指出,立法是八项重点工作之一^{[3]112}。伯内特在1947年11月就任担当官之后的首次公开演讲中,明确将立法放在各项改革事务的首位^{[3]305}。从日本方面的举措来看,在基尼提出日本图书馆改革计划之后没多久,日本文部省和图书馆界就根据使节团报告书和改革计划的要求,调研并制定了《图书馆法》应当规定的事项^{[3]40-42}。在1947年到1949年两年多时间内,日方先后公布了十余份文案,足见法律的制定是改革的重中之重。

2.4.2 《图书馆法》的意义

从根本上说,《图书馆法》实现了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

《图书馆法》促进日本公共图书馆的根本转变。①发展理念的转变。以往日本公共图书馆

是官僚机构的一部分,担当着让民众服从政府的职能。日本学者认为,战后图书馆的立法工作,存在着“路线斗争”,即到底是依靠国家强制力还是依靠民众的支持来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8]。从《图书馆法》的制定及后来的发展来看,战后日本公共图书馆界基本确立了依靠民众来发展事业的理念。②基本职能的转变。公共图书馆应当“让民众思考和提问,而不是顺从政府的意志”^{[3]421}。战后的日本公共图书在实现思想普及、培育合格公民的同时,也承担着维护民众基本权益的重要职能。从“和平宪法”的角度来看,公共图书馆是实现日本民众生存权、学习权、认知权、参政权和享受闲暇权的重要设施^{[9]5-11},其中保障认知权和参政权值得一提。日本宪法规定了“表现自由”的原则。为了贯彻这一原则,日本图书馆协会 1954 年制定的《图书馆自由宣言》认为,“为具有基本人权之一的认知自由的国民提供资料和设施,是图书馆最重要的任务”^[10],而认知自由与表现自由是二位一体、不可分割的,保护认知自由也就是保护了表现自由。公共图书馆与民众参政权的关系,一方面可以从图书馆普及民主思想的职能看出,另一方面,馆藏资料也给民众提供了了解、参与政治的重要信息。

《图书馆法》引领了日本公共图书馆的战后发展。战后初期,日本人均馆藏为 0.1 册^{[3]421},1933 年时美国人均馆藏为 1.3 册^{[3]421};日本人均外借量为 1/17 册^{[3]422},美国人均外借量接近 4 册^{[3]422};日本人均经费为 0.004 美元^{[3]425},1938—1939 年美国人均经费为 0.62 美元^{[3]425}。在战后的十多年内,这一状况并未有太大改观,日本公共图书馆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发展较为缓慢。在《图书馆法》的理念和原则的指导下,

以日本图书馆协会为代表的图书馆界不断探索并找到了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促进了事业的进步。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公共图书馆已经有了极大的改观。与战后初期的数据相比,1984 年,馆藏总量从 737 万册^[4]增加到 1.1 亿册^[11],借阅总量从 400 余万册增加到 2.3 亿册^[11],专业馆员也从不足 5 000 人^{[3]423}增加到 1.1 万余人^[11]。以有山崧(曾任日本图书馆协会秘书长)为代表的声音认为,《图书馆法》有着多重价值,维护法律的“先进性、指导性、奖励性”,是解决现实和法律之间差异的方法^{[9]214-215}。他对比 20 世纪 60 年代与 50 年代的情况,认为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已经有了飞跃,这正是《图书馆法》效力的体现。也就是说,虽然图书馆法存在着一系列问题^①,乃至被认为是“缺乏实质”,但是其高扬的理念明确了公共图书馆的本质所在,让图书馆界能够为之奋斗和前行,从而不断缩小法律规定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差距。

2.5 促进专业队伍建设

2.5.1 改造专业队伍的构想

战前,日本只有文部省在 1921 年设立的图书馆员教习所一家培训机构,对初中毕业生进行为期一年的实务教育^[12]。1947 年,文部省将教习所改为职员养成所^②,继续开展短期实务培训。在基尼看来,日本的专业培训没有合理的课程安排,无法培养现代图书馆技术人才,导致很多学生在毕业后成了档案管理员而非图书馆员。为此,他提出要建设图书馆专业学校,这是提升日本公共图书馆专业水准的需要。有了专业的人员,公共图书馆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才能争取到更多的经费^{[3]423-427}。

① 日本图书馆界认为《图书馆法》缺乏实际效力,主要表现在:没有确立图书馆义务设置制度和中央图书馆制度,缺少强有力的国库补助制度和馆员专业培养制度。义务设置制度指的是明确地方政府必须要设置公共图书馆。中央图书馆制度指的是在都道府县(都道府县是日本的广域行政区划,相当于我国的省级行政单位)一级设立中央图书馆,指导和协调本地区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国库补助金是日本中央政府提供给符合一定标准的公共图书馆的财政补助,不过数量一直极少。馆员的专业培养也未形成全面、有效的体系。

② 养成所在 1964 年改为日本图书短期大学(大专),1971 年改称图书馆情报大学,现已合并到筑波大学。

《图书馆法》确立了司书^①专业资格制度。法律规定取得司书资格必须具备相应的学历,同时还要通过图书馆学课程的专业教育培训。法律实施之后,日本政府组织所有在职馆员参加专业课程培训,获取司书资格。在培训在职人员的同时,美国重点关注设立图书馆学高等教育机构日本图书馆学校(Japan Library School, JLS)以培育全新的图书馆学人才。这是将美式图书馆事业、学科的理念和实践全盘移植到日本必不可少的措施——通过培养“代言人”的方式逐步培养接受美国事物的全新日本人——公共图书馆事业也不例外。与法律和制度建设相比,人才或者思想观念的培养更为重要,这是“再定位”“再教育”政策的具体要求。

2.5.2 JLS 的设立和运转

《图书馆法》制定之后,美国军方找到 ALA (美国图书馆协会),希望其出面协助日本成立 JLS。ALA 方面先后两次赴日实地调查,选中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准备依次开设 JLS。经过充分酝酿和沟通,ALA 选择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学教授吉特勒(Robert Gitler, 1909—2004)作为 JLS 首任校长,同时成立了 JLS 的咨询委员会。之后,ALA 开始甄选赴日教学的教师人选。吉特勒认为,选择教师要有一定的标准,第一点就是要在专业领域处于第一流的位置,同时还要有献身工作的正派人格^{[6]174}。经过筛选,两位图书馆学专业教师和三位图书馆员成为 JLS 的首批美方职员。吉特勒在 1950 年底来到日本。通过综合考虑,他决定将 JLS 设在庆应义塾大学。因为他最看重大学“对于西方思考、思想教育方法的认识、理解和接纳”^[12],而庆应大学在这一点上得分最高。

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军的支持下,JLS 拥有了专业图书 6 000 册。当时招生的对象是新学制下的大三学生和改革前的大学毕业生。第一批共有 113 人参加考试,最终入学人数为 59

人(男性 29 人,女性 30 人),其中 33 人曾在图书馆工作,14 人曾在 CIE 图书馆工作。JLS 第一期共设置 17 门课程,包括图书馆、馆员与社会,图书目录法和图书资料分类法,图书资料高级目录法和分类法,图书与图书馆史,辞典参考书和图书目录的使用方法,辞典参考书目录,图书馆视听觉教材,学校图书馆及其经营,儿童青少年图书馆事业,儿童文学和童话,农渔村图书馆设施,社会成人教育和图书馆,馆员的教育,图书馆组织、管理和经营,图书选择法和读书指导等 15 门欧美图书馆学课程,以及和汉书目录分类法、和汉图书资料两门传统课程。JLS 安排学生在暑期到日本各地的 CIE 图书馆完成实习和参观等实践课程。课程用英文教学,课堂上设有翻译。课程鼓励学生进行讨论,改变了日本以往以教材为中心的授课方式。

1952 年美国结束对日本的占领之后,吉特勒积极寻求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帮助,日方人士也向基金会表达了继续开办 JLS 的请求。1952 年 6 月,基金会给予 JLS 运营经费的支持。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吉特勒在庆应大学担任了五年的 JLS 校长,为美式图书馆学在日本的生根发芽做出了重要贡献。1956 年,吉特勒回到美国,庆应义塾大学承担了 JLS 的运营工作。JLS 改名为图书馆学科,成为庆应义塾大学的正式学科门类。在 JLS 发展的同时,日本其他大学先后建立起图书馆学科或专业培训机制。由此,日本的公共图书馆专业人才培养的两种途径逐步形成,即通过图书馆学高等教育或通过高校的图书馆学专业培训获取司书资格,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日本公共图书馆专业人才的队伍建设。

3 发展阶段

3.1 概况

日本公共图书馆改革 1946 年正式起步,

^① 司书在法律语境中特指日本公共图书馆专业人员,但是日本社会一般将所有类型的图书馆专业人员均称为司书。

1950 年 4 月《图书馆法》通过之后,基本结束。此后直到 1952 年,还有一些政策和举措,例如创办 JLS,也可以看作是改革的组成部分。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在整个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即 1945—1952 年的将近 7 年的时间内,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改革可以分为酝酿、起步、展开与转折、收尾、余波五个阶段。从 1946 年 2 月到 1950 年 8 月,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在以图书馆担当官为核心、文部省具体执行、图书馆界参与的体制之下,展开了以立法工作为核心的改革进程,主要有起步、展开与转折、收尾三个阶段。酝酿阶段和余波时期也与公共图书馆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酝酿阶段从日本投降至 1946 年 1 月,这一时期尚未有明确的图书馆政策提出,但 CIE 图书馆在此时开始设置。余波阶段从 1950 年 9 月至 1952 年 4 月,《图书馆法》通过后,日本公共图书馆进入战后发展的新时期,在 ALA 的协助下,日本设立了 JLS,形成带有美国色彩的公共图书馆专业人才培养机构和模式。

3.2 起步阶段

这一时期从 1946 年 2 月到 1947 年 4 月。日本的民主改革在这一时期全面开展,指导性文件《美国对日教育使节团报告书》正式公布。CIE 图书馆在各大城市建成并开放。CIE 设置了专门的图书馆担当官,由基尼担任。基尼上任之初,根据盟军总部的命令,要求各地图书馆禁止收藏和提供军国主义书刊资料,允许民众自由阅览社会科学图书^{[3]37}。基尼认真了解日本图书馆事业的概况,结合报告书的内容和自己的思考,制定了“基尼计划”。基尼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和会议,创立了“金曜会”机制,逐步引导日本政府和图书馆界树立公共图书馆为民众服务的理念。他还指导日本图书馆协会进行改组,提升其专业性和代表性。这一时期,立法工作正式起步,日本图书馆界提出了第一份图书

馆法草案,是新时代的首次立法尝试。不过此时,盟军总部社会教育的政策重点是建设公民馆。在此情况下,图书馆改革工作的核心——图书馆立法工作失去了来自上层的支持,没有实际的进展,主要起到了唤起社会各界关注改革的作用。伴随基尼在 1947 年 4 月突然被解职,起步期正式结束。

这一时期各项工作均是在基尼的主导之下进行的,因此这段时间也被称为“基尼的时代”^{[3]50}。基尼(1891—1962)曾经在蒙大拿大学图书馆担任馆长,离职之后^①,辗转进入美国军方部门工作。1947 年 4 月,基尼突然被美国军方辞退。他被解职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开始积极反共,而基尼被认定是共产党员^[13],故此被盟军总部解职。对于基尼而言,突然解职是一个巨大打击,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悲剧”^{[3]51}。日本图书馆界很敬重基尼,认为他有着诚实的品质,愿意倾听日本图书馆人的意见,将日本的问题看作是自己的事情,认真思考加以解决^{[3]51}。

基尼最为人称道的工作是制定了“基尼计划”,这一计划首次对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进行全面的规划和安排^{[3]108-111}。基尼以美国加州的图书馆事业为蓝本,为日本设计了一整套统一的服务网络体系结构。计划提出,将图书馆提升到与学校同等重要的地位,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网络体系。计划认为,在都道府县的广域范围内,图书馆按照统一标准,以总分馆体制建设,由图书馆学专业学校培养的馆员运营。分馆可以是图书馆,也可以是学校、俱乐部、民众集会所、店铺和邮局,均要遵守统一的服务规范。总分馆体系之间的各家图书馆实行资源共享。公共图书馆、中小学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县立图书馆和国立图书馆等所有类型的图书馆要联合起来,通过各种方式满足社会的读书需求。计划指出,编纂全国性的综合书目是网络

① 基尼和他的妻子玛丽都是左翼人士,有社会主义思想。20 世纪 30 年代,基尼因为反对校方干涉图书馆的藏书政策,被非法解除职务。之后,基尼进行了数年之久的诉讼,获得胜利。由于 ALA 非难基尼的左翼色彩,基尼等人在 1939 年成立了旨在保护馆员权利的“进步图书馆员理事会”(Progressive Librarians Council)。

体系“联系中枢”所在。为了实现计划的内容,基尼拟定先由文部省召开全国馆长会议,统一思想,其后召开社会各界参与的大会,确定适当的实施方案。在方案最后,基尼认为要尽快建立图书馆专业学校,这是“急切”的任务。然而“基尼计划”没有得到盟军总部的支持,并未得到实施。将“基尼计划”与英国图书馆学家麦克考文的报告《大不列颠的公共图书馆系统:现状及战后重组的报告》^①的结论相比,可以发现不少共同之处,例如都强调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全局性、统一性,都提出设立专门的机构或是人员协调全国性的公共图书馆事务,为民众提供标准化、规范化的服务。这种相似性反映了欧美学界对于公共图书馆事业高度一致的认识,代表了当时图书馆学的发展水平。

3.3 展开与转折阶段

这一时期从1947年5月至1949年3月,日本图书馆界成为改革事业的主力军。日本已经全面确立新教育法制体系,正式实施改革后的教育制度。从日本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来看,《国立国会图书馆法》通过并执行,《学校图书馆手册》正式发布,“金曜会”机制下的立法活动全面展开。日本图书馆事业呈现多头并进的局面,改变了第一阶段以来公共图书馆事业“一枝独秀”的局面。CIE图书馆在日本各地广泛建立和运营起来。

盟军总部的公共图书馆政策在此时并不明朗,依旧主推公民馆的建设。在尼尔森兼任一段时间担当官之后,盟军总部选中伯内特担任图书馆担当官。他是日比谷CIE图书馆的第一

任馆长,所以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到了CIE图书馆的运营和管理方面。在这种局面之下,公共图书馆的改革出现了一冷一热的局面。一方面,美方未将公共图书馆改革列为优先事项,同时意识到公共图书馆的经费、网络体系、专业队伍建设等问题很难一下子解决,不再热心推动图书馆立法事业;另一方面,日本图书馆界积极讨论立法问题,不断推出一稿又一稿的公共图书馆法草案,逐步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意见和看法,鼓动日本政府加快立法进度。1948年底,盟军提出“经济安定九原则”^②,强调日本政府要缩减收支,保证整个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当时图书馆界普遍认为图书馆法需要政府强有力的财政支出,这进一步加剧了政府与图书馆界之间的矛盾。因此,虽然有日本图书馆界的热切盼望,努力推动,但是盟军总部以及日本政府并不支持立法工作。在1949年春天,图书馆法草案没有进入国会的审议日程,公共图书馆立法遭遇重大挫折。这一时期随着伯内特的归国告一段落。

被称为“日本图书馆界的先觉者”^[14]的中田邦造(1897—1956),在这一阶段退出了日本公共图书馆的改革,反映出新旧交替过程中一部分日本图书馆人无法适应转型变革的状况。战前,中田邦造在石川县立图书馆担任馆长的时候,开展读书班级、青少年文库^③等读书指导活动,推动农村青少年读书^[15]。1940年,中田邦造转任东大附属图书馆司书官,由他开创的读书指导活动走向全日本,成为国策。然而这时候读书会活动已经蜕变为“练就皇国臣民精

① 麦克考文分析当时英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利弊得失,提出加强公共图书馆的重组整合,构建全国性的网络体系,加大中央扶持以及培训力度等具体意见。参见 Mccolvin L. R. Public library system of Great Britain[M]. London: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1942.

② “经济安定九原则”包括:实行平衡预算,改革税制,限制信贷,稳定工资,扩大、加强价格统制,改善外贸管理方式,对出口工业的原料供应实行重点分配,增加国产原料和工业品的生产,提高粮食征集工作效率。参见(日)小林义雄. 战后日本经济史[M]. 孙汉超,马君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33.

③ 读书班级活动将农村地区20—30岁的青年骨干组织起来,在三年时间内,通过每月一次的例会,交流读书心得,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能力。图书由中田指定,内容相当广泛,马克思的著作也被纳入书单。青少年文库针对的是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基本活动方式与读书班级类似。

神的活动”,“中田自由主义及教养主义的初衷已经毫无保留”^[16]。在二战中,他就任日比谷图书馆馆长,千方百计保护珍贵藏书免遭美军轰炸,抢救了东京地区的 40 万册图书^[17]。

二战结束之后,中田邦造参与到日本公共图书馆的改革之中。以他为核心的小组开展实地调查,根据美方意见草拟了《图书馆法规应当规定的事项》,提出图书馆法应当明确各级地方政府根据标准设置图书馆的义务,应当设立国立中央图书馆,形成全国性的中央图书馆网络体系,各级政府应当设置专门管理图书馆事业的部门^{[3]42-43}。这些意见表明中田邦造等人认识到要对公共图书馆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不过,美方注重的免费服务,开展读者活动,关注未成年人等理念和实践并没有出现在方案之中。这表明中田邦造虽然支持改革,但是依旧保留旧的思想 and 做法,并没有领会到美国图书馆学注重服务、关注民众的核心理念。由于理念和思想已经落后于改革的进展,中田邦造无法承担起推动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转型变革的重任。在退出改革之后,中田邦造回到宗教阅读等领域,不再关注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改革。

3.4 收尾阶段

这一时期从 1949 年 4 月年至 1950 年 8 月。盟军总部认为《图书馆法》通过之后,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改革基本结束,不再由专人指导,故而在法尔薇瑟、尼尔森之后,美方停止任命图书馆担当官。日本政府成为此时改革事业的主推手。这一时期,美国的占领政策日渐转变,特别是中国形势的变化,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将日本打造为远东基地的政策。为此,盟军总部通过日本政府加紧管控社会,力求稳定,整体政策出现倒退,不太可能推动出台强有力的改革政策或措施。1949 年 6 月,《社会教育法》正式通过,明确要形成以《社会教育法》为上位法、《图书馆法》《博物馆法》为下位法的社会教育法律体系。与此同时,日本文部省进行了改组,之前

负责公共图书馆事务的文化课被撤销,所有事务归社会教育设施课管辖。这一改组配合《社会教育法》的通过,再次明确了公共图书馆改革的方向。

当时,日本图书馆界仍然坚持公共图书馆应当获得政府强力支持的见解。日本政府则希望图书馆界要认识到客观环境的变化,从现实因素出发考虑立法工作,放弃加大政府支持力度的草案,将法案的重点转移到强调图书馆的公共性,强化图书馆的服务职能,突出图书馆的免费开放等原则性内容上来^{[3]82-83}。鉴于以往立法活动的挫折,在日本政府的劝说之下,日本图书馆界开始妥协,最终接受文部省的看法,按照政府的思路草拟图书馆法草案。1950 年初,草案获得日本政府和盟军总部的支持,提交给日本国会审议。1950 年 3 月,日本参众两院对图书馆法草案进行了审议,在 4 月份获得通过。

4 若干分析

4.1 美国的作用

在 1945 年到 1952 年美国占领日本期间,美国是整个日本的主宰。很自然,美国在公共图书馆改革中担当了指导者、计划者的角色,通过顶层设计明确改革方向,通过间接统治把握改革进度。盟军总部将公共图书馆看作是日本民主改革中“再定位”“再教育”项目的重要设施,着重发挥其普及民主思想的社会职能。美国对改革有较为清晰、系统的目标,设有专门的人员,有一定的资源保障,通过设立 CIE 图书馆,设置图书馆担当官,推动图书馆立法和促进专业队伍建设等具体举措,在以担当官为核心、文部省具体执行和图书馆界参与的体制之下,推动公共图书馆的改革。改革让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全面接受了美式的图书馆学理念和实践,实现了巨大转变。

应该指出,美国主导下进行的改革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关于改革最大成果《图书馆法》的争议可以体现这一点。日本图书馆界对于《图

书馆法》是否应当具有强大的效力这一问题的态度相当矛盾、纠结。一方面因为历史遭遇和美国的影响,他们提出公共图书馆应当走民众路线,不应依靠政府的强力支持发展事业,另一方面却因为公共图书馆处于弱势的现实,他们又希望《图书馆法》在上文提及的四个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日本图书馆协会前理事长塩见昇指出,“如何将崇高的理念部分通过实践使之具体化是图书馆法完成后留下的重大课题”^[18],这反映出《图书馆法》代表的美国理念与日本实际状况之间的差异,也使得落实《图书馆法》注定需要一个漫长的历程。

4.2 日方的情况

日本文部省是改革特别是立法工作的具体执行者,占领前期是奉命行事,中后期开始主持改革。日本战败的时候,文部省意识到旧有体制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下去,因此根据美国意图重开社会教育事业,但是态度颇为暧昧,明显带有不情愿的情绪。以战后初期提出的《图书馆振兴策》为例^[3]¹²²,这份文件仍然采用“皇国”的字眼,认为日本输给了敌人的“科学应用力”,振兴图书馆的目的被明确是为了“再建皇国”,丝毫没有反省、悔罪的态度,与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语气毫无两样。1947年,“和平宪法”公布实施之后,文部省提出第二份振兴方案。方案将公共图书馆的职能定位为“增进国民福祉”“完善各阶层民众的教养体制”^[3]¹²⁸,比以往的看法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依旧没有将图书馆看作是普及民主思想的社会机构。随着改革的深入,文部省接受了美方对于公共图书馆的观点和理念,承担起《图书馆法》的制定工作,秉持美方的目标和要求,推进改革的进展。在具体细节上,日本对美国的做法做了一定程度的变通,图书馆协议会制度是个典型案例。协议会是《图书馆法》仿照欧美图书馆理事会设置的机构,由于当时主客观原因的限制,最终协议会只保留了理事会的形式,并没有决策、运营的基本职能,成为馆长的咨询机构^[19]。

日本图书馆界全程参与了公共图书馆的改革,与日本政府共同打造了符合美方意图的全新公共图书馆体系。摆脱以往发展的陈旧途径,就要变革观念和实践,这就注定存在一个磨合、探索的过程。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公共图书馆进入“低迷”“不景气”的时代,是改革阵痛的具体体现。为了走出阴霾,日本图书馆界在观念和实践上均进行了转型。首先实现了观念转型。1954年的全国图书馆大会通过了《图书馆自由宣言》,强调公共图书馆保障民众认知自由的职责。1957年开始的“图书馆法改正运动”引起了图书馆界的大讨论。到了1961年,日本图书馆界否决了要求《图书馆法》强化政府支持的修正案,再次强调公共图书馆要依靠民众发展的思路。其次实现了实践转型。在50年代的时候,由于服务手段依旧保持着战前的模式,日本公共图书馆的发展相当缓慢。1963年,日本人均外借数量为0.09册,与1954年的数据相同^[20]⁷⁰。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图书馆协会在日本各地寻找有特色、有成效的图书馆进行调查,推出了《中小报告》(全称是《中小都市公共图书馆的运营》)一书,提出中小型公共图书馆是发展的重点,号召落实《图书馆法》的理念,参照CIE图书馆的具体做法,强化公共图书馆保障认知自由、提供免费服务的职能^[21]。接受意见的大阪府箕面市图书馆,简化外借手续,实行开架借阅,取得了良好的效益。1974年,箕面市的人均外借数量达到2册,而当时日本全国的人均外借量仅为0.6册^[20]⁸⁴。1970年,在《中小报告》的基础上,日本图书馆协会推出了《市民的图书馆》,进一步提出应当重视外借、儿童服务、全地区的服务的观点^[22]。由此,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找到了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基本赶上美国、西德等国家的水平^[23]。战后日本公共图书馆改革奠定的基本框架,在图书馆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得到了落实,从美国移植而来的理念和实践,最终在日本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5 结语

1945—1952 年美国主导下的日本公共图书馆改革,是研究和探讨日本公共图书馆发展历史、日本战后社会改革历史和战后美国文化传播的切入点。对于日本公共图书馆发展历史而言,改革有着明确的目标,完整的政策体系,稳步实施的策略,一步一步地朝着预定的民主化目标前进,最终实现了公共图书馆职能定位、运营模式、政策法规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深刻变化。改革实现了成功转型,是日本公共图书馆发展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当然,改革并不能马上奏效,一个全新体系嫁接到日本公共图书馆的躯体之上,免不了碰撞和挣扎。正是日本图书馆界的一番番努力探求才造就了今天的局面。

对于日本社会改革和美国文化传播而言,

两者要联系起来看待。日本公共图书馆的改革,打造了一个以美国为蓝本的全新公共图书馆体系,是美国“再定位”“再教育”政策乃至民主改革成效的具体体现。美国学者道尔指出,美国改造日本的过程中,不仅关注法律和制度的建设,更着力重塑每一个日本人的思想与情感^[24]。战后改革在实现日本非军事化、民主化、经济繁荣的同时,也让美国成为日本“政治的监护者、民主化的教师、国民精神的导师”^[25],促进了日本的发展,更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要求。用日本学者松田武的话来说,战后的日本对美国形成了“半永久性依存”^[26]。这种依存性是美国文化输出的具体体现之一。公共图书馆的改革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美国对日文化输出的具体过程——展示、传播美国文化的优越性,在专人指导下构建起一整套美式法律和制度体系,培养接受美式思想和实践的专业队伍,实现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全盘美国化。

参考文献

- [1] 王振锁. 日本战后五十年1945—1995[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2. (Wang Zhensuo. Fifty years of postwar Japan 1945-1995[M]. Beijing:World Affairs Press,1996:2.)
- [2] 张晓莉. 占领时期美国对日文化改革与民主输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Zhang Xiaoli. The U.S. cultural reform toward Japan and democracy export during the occupation period[M]. Beijing: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2013.)
- [3] 裏田武夫,小川剛. 図書館法成立史資料[M]. 東京:日本図書館協会,1968. (Urada Takeo,Ogawa Takeshi. Materials of library act history[M]. Tokyo:Japan Library Association,1968.)
- [4] 佐藤政孝. 図書館発達史[M]. 東京:みずうみ書房,1986:300. (Sato Masataka. Development history of library [M].Tokyo:Midzuumi Shoten,1986:300.)
- [5] 小川徹,奥泉和久,小黑浩司. 公共図書館サービス・運動の歴史:戦後の出発から現代まで[M]. 東京:日本図書館協会,2006. (Ogawa Toru,Okuidzumi Kadzuhisa,Oguro Koji. A history of public library service and movement II from postwar to now[M]. Tokyo:Japan Library Association,2006.)
- [6] 今まど子,高山正也. 現代日本の図書館構想:戦後改革とその展開[M]. 東京:勉誠出版,2013. (Kon Madoko,Takayama Masaya. Library conception in modern Japan[M]. Tokyo:Bensei Press,2013.)
- [7] 大島真理. CIE 図書館の女性図書館員たち[J]. 図書館界,2004(4):224-235. (Oshima Mari. Women librarianship in CIE libraries[J].Library Community,2004(4):224-235.)
- [8] 西野一夫. 図書館法改正と議会要請活動の意義について[J]. 図書館界,2009(2):85-90. (Nishino Kadzuo. Library act revision and meaning of lobby[J]. Library Community,2009(2):85-90.)
- [9] 森耕一. 図書館法を読む[M]. 東京:日本図書館協会,1990. (Mori Kouyichi. Reading library act[M]. Tokyo:

- Jap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90.)
- [10] 日本図書館協会. 図書館の自由に関する宣言[EB/OL]. [2015-07-09]. <http://www.jla.or.jp/library/gudeline/tabid/232/Default.aspx>. (Japan Library Association. Statement on intellectual freedom in libraries[EB/OL]. [2015-07-09]. <http://www.jla.or.jp/library/gudeline/tabid/232/Default.aspx>.)
- [11] 日本図書館協会. 日本の図書館統計経年変化[EB/OL]. [2015-07-09]. <http://www.jla.or.jp/Portals/0/data/iinkai/図書館調査事業委員会/公経年2014.pdf>. (Japan Library Association. Statistics of Japanese libraries[EB/OL]. [2015-07-09]. <http://www.jla.or.jp/Portals/0/data/iinkai/図書館調査事業委員会/公経年2014.pdf>.)
- [12] 三浦太郎, 根本彰. 占領期日本におけるジャパン・ライブラリースクールの創設[J]. 東京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紀要, 2002(41): 475-489. (Miura Taro, Nemoto Akira. The establishment of Japan library school under the allied occupation[J]. Bulletin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2002(41): 475-489.)
- [13] 三浦太郎. 占領期初代図書館担当官キーニーの来日・帰国の経緯および彼の事績について[J]. 日本図書館情報学会誌, 2000(4): 141-154. (Miura Taro. On the achievements of P.O. Keeney, the first library officer of the allied powers,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his arrival in and departure from Japan[J]. Journal of Japan Societ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000(4): 141-154.)
- [14] 梶井重雄. 図書館界の先覚者中田邦造先生の著作年表[J]. 北陸学院短期大学紀要, 1978(10): A1-A24. (Motoi Shiego. Work list of library pioneer Nakata Kunizo[J]. Bulletin of Horiku Junior College, 1978(10): A1-A24.)
- [15] 福永義臣. 地方図書館創成期の自己教育思想と活動の展開—中田邦造の読書指導の実践を中心に[C]//九州大学大学院教育コース院生論文集, 2002(2): 185-189. (Fukunaga Yoshiomi. Development of the thought and activities of self-education in the early period of local libraries; concentrating on Nakata Kunizou's activities of reading education[C]//Kyushu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Student Essay Collection, 2002(2): 185-189.)
- [16] 叶沢清介. 読書運動[M]. 東京: 日本図書館協会, 1974: 33. (Kanouzawa Sesuke. Reading movement[M]. Tokyo: Jap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74: 33.)
- [17] 日比谷図書館と蔵書疎開[EB/OL]. [2015-07-09]. <https://ja.wikipedia.org/wiki/中田邦造>. (Hibiya library and collection evacuation[EB/OL]. [2015-07-09]. <https://ja.wikipedia.org/wiki/中田邦造>.)
- [18] 塩見昇. 完善图书馆的法律依据: 意义、现状和课题 (图书馆立法与制度建设)[EB/OL]. [2015-10-12]. <http://repository.kulib.kyoto-u.ac.jp/dspace/bitstream/2433/66080/1/26.pdf>. (Shiomi Noboru. Legislative authority of improving public library: meaning,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library legislation and system construction)[EB/OL]. [2015-10-12]. <http://repository.kulib.kyoto-u.ac.jp/dspace/bitstream/2433/66080/1/26.pdf>.)
- [19] 図書館法[EB/OL]. [2015-07-09]. <http://law.e-gov.go.jp/htmldata/S25/S25H0118.html>. (Library act[EB/OL]. [2015-07-09]. <http://law.e-gov.go.jp/htmldata/S25/S25H0118.html>.)
- [20] 是枝英子. 現代の公共図書館・半世紀の歩み[M]. 東京: 日本図書館協会, 1995. (Koeda Eiko. Modern public libraries; step of half century[M]. Tokyo: Jap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95.)
- [21] 日本図書館協会. 中小都市における公共図書館の運営: 中小公共図書館運営基準委員会報告[M]. 東京: 日本図書館協会, 1963. (Japan Library Association. Public library operation in small-medium cities[M]. Tokyo: Jap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63.)
- [22] 日本図書館協会. 市民の図書館[M]. 東京: 日本図書館協会, 1970. (Japan Library Association. Citizen's library[M]. Tokyo: Jap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70.)

2015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在广州市举办

由文化部主办,中国图书馆学会等相关单位共同承办的“2015 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中国图书馆展览会”将于 12 月 16 日至 17 日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次年会主题是“图书馆:社会进步的力量”,分为工作会议、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中国图书馆展览会三大板块,是全国图书馆界的年度盛会,也是图书馆事业和相关产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学术会议将围绕年会主题,充分阐述图书馆作为推动社会进步重要力量的价值所在,展示在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过程中,我国图书馆事业所形成的具有世界特征、中国特色、行业特点的发展道路。会议由 4 场主题论坛、20 余个分会场、3 场卫星会及其他非正式会议等不同形式、规模的学术活动组成。

目前,年会参会报名工作已经启动,请各位代表登录中国图书馆学会网站(www.lsc.org.cn)注册报名参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处)

-
- [23] 林树汇,吴建中. 日本公共图书馆的发展[J]. 图书馆,1983(2):12-17. (Lin Shuhui, Wu Jianzhong.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public libraries[J]. Library, 1983(2):12-17.)
- [24] 约翰·W. 道尔. 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M]. 胡博,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206. (Dower J W.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M]. London. W.W. Norton & Co, 1999:206.)
- [25] 李永晶. 二战后美国改造日本的一系列措施[EB/OL]. [2015-08-20]. <http://view.news.qq.com/a/20121113/000014.htm>. (Li Yongjing. American reform in Japan since postwar[EB/OL]. [2015-08-20]. <http://view.news.qq.com/a/20121113/000014.htm>.)
- [26] 松田武. 战后美国在日本的软实力:半永久性依存的起源[M]. 金琮轩,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Matsuda Takeshi. Origin of the semi-permanent dependent-soft power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postwar Japan[M]. Jin Zongxuan,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曹磊 江阴市图书馆馆员。江苏 江阴 214400。

(收稿日期:2015-07-10;修回日期:2015-08-26)